

中国

冯天瑜

杨华

编著

任放

文化史

彩色增订本



K203/115

2007

任放 杨华 冯天瑜
编著

中国

文化史

彩色增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史: 彩色增订本 / 冯天瑜, 杨华, 任放编著.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04-020631-9

I. 中… II. ①冯…②杨…③任… III. 文化史—中国—
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8568 号

首席策划 于健航 策划编辑 于晓宁 责任编辑 于晓宁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刘晓翔 赵 阳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 - 58581000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70 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0631-00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 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 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 希望及时举报, 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 58581896 / 58581879

传真: (010) 82086060

E-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编: 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 (010) 64014089 / 64054601 / 64054588



冯天瑜 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现为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尤其是明清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月华集》、《张之洞评传》、《千岁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著作。

杨华 1967年生，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礼制问题）研究，出版有《先秦礼乐文化》、《新出简帛与礼帛研究》、《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合著）等著作。

任放 1964年生，四川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及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出版有《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合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合著）等著作。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是当代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家，曾有《中华文化史》等多种文化著作问世。本书是作者为大中专院校教学而专门编著的教材，也是作者相关研究的精炼浓缩。本书在重点叙述学术思想文化演变历程的同时，对行为、制度和物质等其他文化层面都有关注。与已出版的多种文化史教材比较，本书对中国文化史整体脉络把握准确，断代分期明晰；材料新颖，吸纳了最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篇幅适中，宜于教学，语言典雅，通俗易懂。书中选插的200幅图片，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史的丰富内涵和曲折历程，大有帮助，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独具特色。

1	导论
3	一 释“中国”
9	二 释“中华民族”
14	三 释“文化”“文明”
18	四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19	五 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28	六 中国文化的特质
30	七 中国文化的地位
33	八 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43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45	一 中国人的起源
50	二 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55	三 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65	四 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73	第二章 青铜时代
75	一 文明的初现
82	二 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86	三 文字的早期形态
91	四 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93	五 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101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104	一 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107	二 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113	三 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124	四 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

130	五 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133	六 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143	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
146	一 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
152	二 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159	三 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164	四 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170	五 帝国文化的固守与外拓
175	六 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178	七 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187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189	一 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195	二 玄学与魏晋风度
199	三 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204	四 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209	五 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
218	六 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229	七 科举制度
233	八 文史自觉
243	第六章 近古文化的定型
245	一 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250	二 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260	三 文化的雅化
272	四 俗文化的展开
277	五 文官政治的确立

282	六 文化中心的南移
287	第七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289	一 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296	二 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299	三 元曲的兴盛
306	四 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319	第八章 晚期帝国文化
322	一 古典文化的集成
330	二 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335	三 理学的嬗变
343	四 启蒙新声
347	五 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
354	六 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359	七 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371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373	一 经世实学
380	二 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385	三 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
392	四 从“维新”到“革命”
397	五 五四狂飙
402	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404	七 文化论争
411	八 汉字改革
415	九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421

结语 中国文化的发展节奏与走向

429

参考图录来源

430

关键词索引

439

后记

关键词:

- | | |
|--------|------------|
| 中国 | 经济土壤 |
| 民族 | 社会结构 |
| 中华 | 国际条件 |
| 华夏 | 宗法制度 |
| 中华民族 | 君主专制 |
| 多元一体格局 | 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 |
| 文化 | “汉字文化圈” |
| 文明 | “儒学文化圈” |
| 自然的人化 | “汉译佛典圈” |
| 物质文化 | 人文传统 |
| 精神文化 | 伦理中心 |
| 制度文化 | 尊君重民 |
| 行为文化 | 中庸协和 |
| 广义文化 | 延绵坚韧 |
| 狭义文化 | 原生文化(文明形态) |
| 文化史 | 突破性文化 |
| 广义文化史 | 连续性文化 |
| 狭义文化史 | “中国之中国” |
| 文化生态 | “亚洲之中国” |
| 地理环境 | “世界之中国” |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西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 1936 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基本特性和历史分期，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

一 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义，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口”，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口（音围）表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1]、最早的传世文献《尚

[1]《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书·周书》^[1]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2];二如国境之内^[3];三如中等之国^[4];四如中央之国^[5],等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6]唐代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7]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8],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

[1]《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2]《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3]《诗·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然于中国,斂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

[4]《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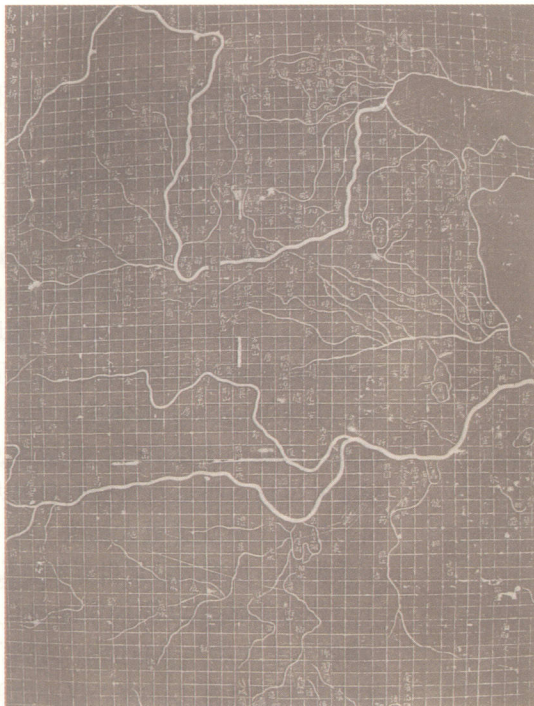
[5]《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6]《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7]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8页。

[8]“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

图0-1 禹迹图。石碑上方偏左处刻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字样，可知此图绘于刘豫阜昌七年（即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比例尺约为1:500万。这是中国最早采用“计里画方”（以方格网络按比例放大）之法绘制的地图。制图区域范围北到河套，南到琼崖，着重表示水系，绘出有名称的河流近80条。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



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含义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战国时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1]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义赋予了某种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

[1]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国之”。^[1]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了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2]。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赋关系，中原王朝

[1] 韩愈：《原道》，前引《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页。

[2] 《元史》卷二〇八《外夷传一》。

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中国”便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真正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个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沙皇俄国以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翰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

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1]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2]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3]。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4]。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戈戈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消乎。”^[5]清人魏源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6]近代学人皮嘉佑在《醒世歌》中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

[1]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45、450页。

[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3页。

[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57页。

[4] 法显：《佛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

[5] 瞿式谷：《职方外纪小言》。

[6] 《海国图志》卷七四。

乏其例^[1]。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2]，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本书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正是在这一逐步扩展并定位的空间中，“中国文化史”得以生发、演绎。

二 释“中华民族”

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统称中华民族。

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中国古籍表述这一概念的有“民、族、种、部、类”等单字词，也有“族类、族部、民群、民种”等双字词。其核心单字词“族”，原义“矢锋”（箭头），引申为众。《说文》曰：“族，矢键也，束之族族也。……众矢之所集。”徐笱：“矢所丛集谓之族。”集合意的“族”，演为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的专称。中国自古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左传·成公四年》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此之谓。

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双音节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以往多认为是从日本输入的。作为单一族群的日本人，在前近代已完整地具备民族诸要素（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文、共同

[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6，第3页，今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诒年编《汪穉卿先生遗文》：“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杭州汪氏1938年版，第13页。

[2]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4月）。